

儒家思想视角下传统宗族聚落空间 营造及其现代启示 ——以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为例

丰顺 刘沛林¹

(长沙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 文章以儒家思想为主线, 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为落脚点, 从聚落生产、生活空间和宗族文化出发, 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布局, 梳理建筑、景观、细部构造有机融合的聚落空间秩序, 得到如下启示: (1) 生态主义规划是美丽乡村风貌的基石, 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前提和保障。(2) 以儒家思想为设计理念的建筑和景观空间秩序有助于有限建筑空间的合理划分, 有助于不同空间功能的有机组合, 有助于聚落资源分配。(3) 细部构造是建筑环境中的精髓, 体现匠人精神, 具有故事性、教育性, 是空间使用者和空间的纽带。(4) 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所派生的空间规划思想, 在继承中发展优秀的空间设计与规划理念, 营造展现传统文化、具有思想内涵的以人为本的聚落空间。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宗族聚落 空间营造 环境设计 张谷英村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6-0206-09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思想学说之一, 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并辐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马克思认为, 学术流派和思想学说的诞生是与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儒家思想是立足于封建社会制度, 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核心依据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 后来儒家们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逐渐形成了儒家思想体系, 历经了先秦的奠基时代, 汉代的独尊儒术时期, 魏晋隋唐的儒、道、释融合时期, 宋明的理学新阶段, 到清朝的清理与总结时期,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1]。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法伦理、科学技术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 是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行事准则与道德规范。

伯纳德·曲米认为“建筑概念并不是‘永恒’的, 它们的‘存亡’取决于空间背后的文脉”, 空间并非静止的结构, 而是形与其所对应的社会活动的映射^[2]。中国传统城市规划、聚落规划、建筑设计、住宅细部设计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与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 与传统文化相生相伴曲折发展。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时代正统思想, 对中国传统聚落空间营造的影响极大, 特别是传统宗族聚落空间能够折射出背后的中国传统文脉主流——儒家思想, 其建筑形体空间体现了相对应的封建时期的乡村宗族社会经济活动特征。

¹**作者简介:** 丰顺 (1993—), 男, 湖南长沙人, 硕士,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设计与城市规划。E-mail:shunfcs@qq.com; 刘沛林 (1963—), 男, 湖南汉寿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E-mail:liu_peilin@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6ZDA15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2071195)

探讨解析传统聚落空间营造的思想文化理论基础,发现传统聚落空间营造理论、范式的优势与劣势,能够让人们更加深入理解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建筑细部设计思路,有利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聚落建筑文化的保护、修复、继承与发展,也会给中国当代空间营造与设计带来启迪与有益思考。

本文以儒家核心思想为基础,从张谷英村宗族聚落文化出发,追溯其空间秩序背后的理论依据,分析张谷英村聚落环境、村民生产生活生态的活动、儒家核心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宏观的村落选址到微观的一砖一瓦,探寻张谷英村宗族聚落空间营造的法则。最后,通过分析张谷英村聚居空间的规划布局设计,思考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传统空间对于当代空间营造的启示。

1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宗族聚落

1.1 儒家“仁、礼、中庸、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在核心。在孔子、孟子看来,“仁”是“爱人”。广义上说,“仁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对于其他个体、集体以及自然的尊重与爱护,是对公平、秩序、和谐的社会体系的追求的具体方法^[3,4]。儒家思想中的“仁”最初建立在血缘基础上,而后发展为亲情、友情、君臣等社会关系的理想,成为一种道德自觉。

“礼”是儒家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儒家人伦秩序的集中体现。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首先“礼”是“贫富、贵贱、长幼、亲疏”中的等级法则,要求我们恰如其分地行使“礼”。其次,“礼”的思想在祭祖、祭祀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封建社会中以血缘氏族、家庭为基础的人伦规范,成了封建社会中的最高道德标准和最高价值取向,提倡集体大于个人的整体利益思想,维护家族的权利,削弱个人的价值取向。

“中庸”是“仁”“礼”的基础伦理道德观,也是方法论。“中庸”是中华民族千年来所奉行的为人处世之道,“中”的思想是内在思想与外在行为的统一,是“人道”与“天道”的结合,提倡“知天命”的淡化人为的思想,要求我们保持初心,持之以恒,同时要“适中、适度”并保持理性的理念。“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人伦道德的理想,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期盼。董仲舒说:“以类合一,天人一也”,讲的是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的有机统一,提倡“人道”的发展应当符合“天道”的运作规律,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2 传统宗族聚落对儒家思想的呈现与表达

儒家思想派生了中国古建筑、古村落、传统住宅的规划建设法则,是中国传统空间营造的理论依据,以空间形态、建造材料、细部装饰等形式为具体表征。宗族聚落是我国传统聚居空间的典型,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包括生产、生活、娱乐等空间的家族聚集式村落空间。宗族聚落在规划建制、空间形态、发展规律等方面独树一帜,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生相伴。

在儒家的核心思想中,“礼”的概念被直接释义到空间规划的法则中,形成了传统社会阶级决定建筑空间等级的建筑制度、建立了兼顾个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规划理论体系。《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三门,國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考工记·匠人》规定了城市标准尺度:王城,诸侯都,卿大夫采邑的逐次递减关系,同时对建筑以及建筑的细部构造有着详尽的礼制规定。《周礼》可以被认为是古代的建筑规范,并且催生了尊卑有序、错落有致、形式多样的中国古建筑体系^[5]。

儒家思想中“仁、礼、中庸”融会贯通,其对于空间秩序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儒家思想以家庭为单位,倡导尊卑、长幼、男女有别的“仁爱”的人伦关系思想派生出了以家族为核心的聚居空间,在传统空间中多以宗祠、堂屋或长者居室为轴心。其次,宗族聚落空间作为传统思想的映射,体现在婚丧嫁娶、庙会戏剧、生产生活等活动中,这些活动在儒家思想的指导规范下,潜移默化地传播了礼制、秩序思想,使教育与空间紧密结合。

在传统聚落营造中要实现人类聚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目标为“天人合一”，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整体规划与布局进行择优选择。首先，“天人合一”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族人与地域紧密联系，因地制宜，满足聚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要求，体现空间营造的地域性、经济性、生态性。其次，古代规划师、设计师、造园师“师法自然”，探求“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借鉴自然元素进行创作，将空间看作是浓缩的、带有特色主题意趣的自然生命体，赋予空间唯一性、生态性。再次，中国传统空间中的装饰元素多取材于周边自然环境，就地取材，发扬匠人精神，讲究美感，实现建筑结构与工艺美术的完美结合，例如徽州古建筑的石雕、木雕、砖雕、墙画等，它们工艺精美、主题鲜明、用料考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建筑装饰、建筑小品承担了传统空间中的“不言之教”的功能，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时代，行使传播故事、传承文化的职能，是赋予居住空间寓教于乐之特性的典型。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宗族聚落营造反映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意识、经济基础、政治环境、氏族信仰和建造水平。中国传统宗族聚落具有同一性，也存在差异性^[3,6]，例如，以家庭为核心的宗族观念延续了宗族聚落的生命力，体现了传统聚落的同一性；由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时代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聚落规划者与使用者对于儒家思想的解读和应用不同，派生了形态各异且极具地方宗族特色的传统聚落，这体现了其差异性。儒家思想就是存在于中国传统聚落同一性和差异性背后的思想文化依据，是打开中国传统建筑和传统聚落之门的“一把钥匙”。

2 张谷英村宗族聚落概况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汉书·沟洫志》说：“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聚落的形成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7]，张谷英村作为独特的湘北传统宗族聚落的典型代表，在儒家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人合一”、屋屋相连的连廊式的宗法聚落形态，派生出了“共生、共存、共乐、共雅”的聚落文化^[8]。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以东的涓洞笔架山和龙形山之下，距离岳阳市区约 60km，地处岳阳、平江、汨罗三地的交汇处。始祖张谷英于明洪武四年（1371 年）开始兴建张谷英村，历经多次增建，其中，当大门、西头岸由第八代子孙张思南奉朝廷之命建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东头岸、石大门由第十代子孙张拱凡和张良甫建于明末清初时期。王家墩、上新屋、下新屋、潘家冲由第十六代子孙张云浦建于清朝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嘉庆十三年（1808 年）。现存建筑主要由明万历年间的“当大门”、清乾隆年间的“王家墩”、清嘉庆年间的“上新屋”三部分组合而成，张谷英村现有房屋 1732 间，厅堂 237 个，天井 206 个，巷道 62 条，总建筑面积超过 5 万 m^{2[9,10]}。张谷英村建造年代久远，历经数百年沧桑，村落依然繁荣兴盛，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时期江南民居古建筑群落，被誉为“民间故宫”“天下第一村”“湘楚明清民居之活化石”（图略）。

作为宗族聚落，张谷英村在儒家礼制的影响下形成了极具特点的祭祖、祭神、祭灶、祭孔等活动^[11]，其中包括每年 9 月中旬的湖南张谷英民俗文化节，村民会来到祖先堂进行祭祀祭拜活动，以此缅怀先人、感恩祈福。张谷英村每年的“晒秋”活动延续至今，“晒秋”是“春祈秋酬”的一部分，属于祭灶，是村民对于丰收的祈求，对于土地的崇敬，对于收获的感恩。村民们将收获的粮食集中在堂屋外、房屋前坪、外廊道间进行晾晒，并用色彩丰富的粮食摆成多姿多彩的图案。

张谷英村村民同样重视家风的建设，因为张谷英村为连廊式宗族建筑群，家家户户相通，许多家庭共享以堂屋为主的公共空间，生产、活动空间开放程度高，所以张家族人十分重视对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维系，提倡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下对于自然、居住、活动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并立下五条族规和十六条家训，以此督促、倡导大家族内部的团结。

张谷英私塾延续至今，其“世业崇儒”“耕读世家”的教育理念和私塾建筑的选址布局是儒家思想根植的印证。张谷英私塾位于当大门第五进间的青云楼，青云楼是全村屋顶最高的建筑之一，位于龙形山的山头，其建筑形态、空间结构与村落中其他单体建筑一致。明朝时期，青云楼二楼便成了传授儒家经典、教书育人、传播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张家家训的地方。张谷英私塾在历史上培养出了许多具有高尚道德品格，学识渊博的优秀人才，并且延续至今。张谷英私塾中传承文化，探求真理的教育理念使得张谷英村以“耕读世家”“世业崇儒”而闻名，私塾成了受到聚落认可的文化传播空间，为村落文化生活的繁荣提供着生生

不息“内力”。

3 案例解读——儒家思想对宗族聚落空间营造影响

3.1 儒学视域下的风水观与宗族聚落选址

张谷英村是中国风水观指导下建造乡村聚落的典型代表，其聚落选址受到传统风水观念影响。《易经》被列为诸经之首，衍生出的“风水术”是易学思想应用的一个部分，儒家思想兼容并蓄、以人为本，更强调以人本角度来运用风水术。风水学中的“地气”“天气”“五行”“葬”“择地而居”等思想与儒学中的“气本论”“五行”“忠孝”思想相关联^[12]。传统风水学认为：阳宅或阴宅周边的环境能够影响居住者的生产生活及命运。传统风水的理想环境格局是对地质情况、水文环境、日照时长、风向、自然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做出正确评价之后的选择^[13]。

风水学这一传统思想观念与实践活动，对于中国古代聚落的选址和布局产生了深刻而又普遍的影响^[7]。风水学有其局限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作为支撑。风水学中包含了地质学、地理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方面的学科知识。近代学者普遍认为：风水学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中国古代建筑理论体系中的三个支柱^[14]。风水学是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建筑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对传统聚落空间、环境空间、重要建筑的设计营造影响极大。

张谷英村基地的选定者——张谷英先生擅长风水术，并对住宅选址有着深刻的研究。元末明初时期，张谷英、刘万辅和李千金从江西到达巴陵涓洞（今岳阳以东），张谷英根据对场地风水的勘测，选择了三块风水宝地。刘万辅选择了“四季发财”之地，李千金选择了“官运亨通”之地，“人丁兴旺”之地就留给了张谷英。“人丁兴旺”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张谷英村址。

张谷英村是风水学中的理想生态聚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张谷英村体现了风水学中对于宅基地选择的生态主义设计理想。张谷英村背靠主峰山——龙形山，与笔架山、旭峰山、大峰山形成四片花瓣状的负阴抱阳的合围结构，整体地势北高南低，不仅保护着张谷英村，使得村落易守难攻，同时又有效抵挡住了冬日来自北面的寒风（图1、图2）。②涓溪河与龙形山组合形成背山面水之势，“青龙（涓溪河）与白虎（龙形山）”相结合，藏风聚气的理想风水之局，为村落的农作物灌溉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涓溪河水贯穿张谷英全村，在人家门前缓缓流过，是形似玉带缠腰的极佳风水。③张谷英村重视自然环境中各要素与聚居空间影响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张谷英村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是“顺气”“乘气”“藏风纳气”之地。阴阳五行说记载：“相地奥妙，尽在五行中”，聚落中土壤、岩性、水文、光照、植被等自然环境要素组合合理，各要素之间协调发展，与人居空间相适应^[15]。④张谷英村展现了风水中的美学理想。风水学与中国山水画联系紧密，均追求山水诗画的风景理想。张谷英村“后有靠山，前带流水”，建筑群粉墙黛瓦，有疏有密，依照轴线排布在山谷之中^[15,16]，是风水学视域下中国传统风景美学的展现。

3.2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与氏族生活、生产空间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信条，它影响、规范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17,18]。这种极具深度的哲学理念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造园活动以及村落规划的基本原则。“天人合一”又称为天人合德、天人相应。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伏羲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即伏羲八卦所提倡的“天、地、人”的三才之道。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对这一思想构建了更为完善的道德理论体系，并规定了社会伦理道德，强调“天道”与“人道”协调统一，强调社会规范与自然法则相映相生的思想^[18]。这种类似于造园的，带有设计师主观臆想的村落建设规范使得中国的古村落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又各有千秋，形态各异^[19,20]。



图1 张谷英村地理位置



图2 张谷英村道路系统

“天人合一”思想与风水学理想类似，追求世外桃源般的理想生态聚落环境。同时，“天人合一”作为一种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对聚落未来的发展、自然资源与空间资源的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7]。①张谷英村“藏风聚气”的地理特征为张谷英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保证了村民生活所需的农作物的种植空间和气候环境。和谐的人地关系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农业生产，也给将来张氏族人利用自然环境进行生产活动的方式以启示。例如延续至今的习俗“晒秋”，是村落生态文明、物资丰饶的体现。②张谷英村族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的同时，又主观改造自然，以达到聚落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例如张谷英村引水成河，将聚居空间内部的水循环与外部水域相连，在满足用水、排水的同时，围绕水系营造出村落内部的公共空间。玉带河环抱着张谷英村，使村落向心内聚、安全防御、易守难攻，在战争年代免受外界侵扰，为氏族繁衍提供了条件^[6]。其次，张谷英村建筑群天井与庭院相通，将建筑空间与天、地相连，用于观景、采光、排水。在建筑围合的同时，天井削弱了建筑群对于聚居空间的限制，营造天、地、人的和谐共存空间，形成顶天立地之势。③村落内部生产、生活、教育等空间划分明确多样，满足氏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满足宗族聚落氏族婚丧嫁娶等祭祀活动的要求，符合氏族中小家庭和谐共处的空间配置要求。

3.3 儒家伦理礼制与轴枝纵横的空间秩序

儒家礼制是我国最早的建筑规范，其对于空间的规划设计更为细致、精准，并阐述了具体的建设方法和要求。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学思想，城市规划以及聚落规划相对多元。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同时对空间形式做了系统化的规范。儒家思想强调重礼、崇孝、尚文。在“克己复礼”的倡导下，儒家倡导“天圆地方”的“轴线”规划理念。《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三门，國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而“中和之道”“择中而立”“居中为制”的城市规划思想作为古都建设的主流理念，也影响着聚落规划理论体系。这种都城规划方式被民间沿用，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与各地方的聚落形态、自然环境相结合，产生新的空间形式。

张谷英村的整体聚落规划符合轴线控制的理念，轴线是控制建筑群的主要元素^[11,21]，其中当大门为“干枝式”布局，各单元房以当大门南北方向的主轴向东西两个方向发散，并同时受到东西向次要轴线的控制，整体空间井井有条。王家墩则为“丰”字型布局，从建筑群平面上看，王家墩以主堂屋，横堂屋的天井为轴，形成了类似于“丰”字的空间组织形态。上新屋则为“井”字型布局，相较于当大门和王家墩，上新屋的空间更加复杂多变，其中，前堂、中堂和上堂形成主要轴线，又各自延伸出支轴与次支轴，其他单元建筑依次排列（图3）。从单元建筑的内容来看，张谷英村内各房屋虽大小不一，但建筑形制相同，大多建筑群由过厅、会面堂层、祖宗堂屋、后厅等形成“四进”的空间组织方式，同时配合天井、门庭、左右厢房和耳房形成主轴与支轴相交的轴枝纵横的空间。建筑材料以木为主，青砖花岗石为辅。



图3 张谷英村当大门、王家墩、上新屋以单元房为单位的轴线分析

张谷英村的内部建筑空间符合儒家礼法制度，是以血缘定亲疏，以亲疏规范空间秩序的设计实践。首先，张谷英村的建筑符合礼制对于民居的规定，《唐六典》对社会各阶层的建筑形式有所规定，其中讲到：平民的堂舍不能超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超过一间两架。张谷英村的建筑符合这一“礼制”法则，当大门是“三间五进五井”的空间结构，王家墩和上新屋分别是“三井四进”“四进七井八横堂”的空间组织形式（图4）。其次，张谷英村居住空间的开间、房间高度、房间位置也有规定：每个次要单元建筑群以堂屋和天井为中心轴线，两边布置房间，同时遵守“先左后右，男尊女卑，长幼尊卑”的居住规定。次要单元建筑同时也符合整体建筑群的“礼制”等儒家思想派生的伦理道德规定。再次，张谷英建筑群受到“天圆地方”观念影响，以方形天井为单位，采用方形围合式布局。方形围合的布局形式不仅营造了以中轴线为基准的公共空间，也一定程度上均衡了两侧的单元空间，是对中国传统空间中方形围合基因的继承与发展^[22]。礼制规范着聚落形成之初的营造法则，同时也规范着后世族人对于张谷英建筑群的改造与加建，从聚落形成至今，张谷英村新修建筑都遵循了以原有轴线为基础的宗族聚居空间布局形式。

总体来说，张谷英的建筑群遵循以一定数量的堂屋为主轴的方形围合形态，形成建筑群内公共空间，再以左右的厢房、耳房为支轴的形式形成以大家庭为核心的聚居空间。主轴所在的空间配合天井的排水和采光等功能，形成了类似于四合院式的“室

内”院落空间，符合湘北的气候环境，也为家庭聚集、餐食和其他活动提供场所。支轴空间多为半封闭起居空间，居住序列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左为上，南为阳”的宗族观念。



图 4 张谷英村当大门建筑群中宗祠的“三间五进五井”空间结构

3.4 儒家思想与宗族聚落的特色营造、细部空间

3.4.1 张谷英村聚落落的“向心性”布局

张谷英村设计精妙，向内形成大围场，建筑无缝对接，户户相通，蕴含着血脉亲情永不断裂的思想。张谷英村受儒家“三纲五常”，以家庭为根本，侧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23]的影响，在聚落内部形态上呈现“向心性”^[4]，全村上下团结，共同谋求生存与发展。张谷英村以“宗祠—当大门—上新屋”为主要轴线，而王家墩、西头岸、聚龙湾、下新屋分布于轴线的两侧。当大门作为最早建成的建筑群，其建筑空间同样有着明显的轴线性，当大门主轴上的门厅被看作是全村的入口^[24]。主轴上的堂屋要高于其他建筑空间，堂屋、天井的室内地面跟随主轴方向依次升高 10cm，而祖堂要升高 20cm。建筑由外（当大门一侧）到当大门祖堂逐级升高，这样的建筑形式有利于排水，而靠近龙头山一侧的祖堂是整个建筑群（当大门）中最高的，这充分体现了祖堂在聚落居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反映了张谷英村重视以“仁”“孝”为核心的空间组织观念。

3.4.2 巷道与单元建筑之间的联系

张谷英村巷道是聚落中的线性空间，起到串联其他空间的作用。张谷英村有“分则自成庭院、合则贯为一体”的屋屋相连的连廊式宗族建筑特点，体现儒家“仁爱”“大一统”理念。通常情况下，巷道连接着以堂屋为支轴的建筑空间，于主轴两端或一端位置形成节点，将各单元建筑有机串联。除了连接单元建筑两端的与主轴交叉的巷道外，也有与建筑体主轴平行的巷道空间，这类巷道位于单元建筑两侧，空间形态与前者无异，但是更加隐秘，主要服务于需要快速穿行的聚落居民，而且不容易被外来者发现。村内共有 60 条长短不一的巷道，纵横交错，巷道两侧建有高墙，上面以瓦片覆盖，形成“晴不暴晒，雨不湿鞋”的张谷英特色巷道空间，这种巷道布局形式给居住带来了极大便利。

其次，巷道的尺度考虑到了张谷英村建筑群防火的功能，巷道通常宽 1.5m，高度与左右建筑保持一致，顶端是可活动的覆盖式瓦片，适宜攀爬的巷道宽度允许村民在建筑物受到火灾侵害时，手脚并用，撑住两侧，利用巷道两边的墙体爬上屋顶、揭开瓦片，一是使得空气流通，避免火灾向另一侧转移，起到隔绝的作用，二是当有雨水时，方便雨水流入，创造出灭火机制。

3.4.3 “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与建筑细部

张谷英村的建筑细部是聚落历史、人文、信仰、经济水平的综合体现。当大门建于明代，是今天张谷英村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有着很高的地位。当大门门前有两个石鼓（图 5），分别位于大门两侧，其尺寸大于多数村中石鼓，被称为“门当”，石门框横梁上太极图形，叫做“户”。“门当”与“户”是家族势力、财力的代表。民间所说的“门当户对”就出自这两种建筑构造，是传统观念中择偶的评判标准。



图 5 张谷英村当大门石鼓

张谷英村的建筑装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派生出了独具一格的湘北建筑装饰元素^[11]。张谷英村门板、窗户、屏风、雀替等建筑结构多取材于村落周围的自然资源，结构敦实，用料厚重，颜色黑里透红，与建筑的黑白主色调相符。建筑装饰运用了浮雕的手法，展现山水花鸟、氏族典故和神话故事，丰富了建筑细部装饰。张谷英的建筑装饰在结构上具有功能性，表达形式上具有多样性，极具美感。同时，这类叙事性强、寓意深刻的文案样式具有教育意义，将文化赋予在建筑结构中，起到了传承文化、继承思想的功能。

张谷英村的窗板雕花多有祈福、宗族兴旺的寓意，例如图 6 中有龙、喜鹊、祥云纹、卷草纹和梅花作为雕饰的窗版，题材均取材于民间，龙与祥云纹象征着步步高升、瑞气祥和；喜鹊、卷草纹代表吉祥如意、生机勃勃；梅花在古代又称“报春花”，是春天的象征。整幅窗板如画般精美，体现张氏族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窗板可以开合，满足建筑采光、通风的要求，并且工艺精良，年代久远又不失其风采，体现了张氏族人对细部的考究（图 6a）。又例如图中的蝙蝠雕刻，古代取蝙蝠谐音“福”，象征吉祥、福气。其形象栩栩如生，不仅展现出蝙蝠飞行时的体态和风采，又与周边的纹理图案相连接，融为一体（图 6b）。



图 6 张谷英村窗板木雕

3.4.4 完整高效的排水系统

张谷英村的排水系统合理通达^[9,14]，具有“溪自阶下淌，门朝水中开”的完整的排水系统。张谷英村地处湘北多雨潮湿的低洼地区，建筑群却从未遭受过洪涝的灾害，有效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是“天人合一”生态设计的印证。张谷英村的天井是各单元建筑中唯一的排水渠道，其排水孔宽度仅为 20cm，由长方体麻石块砌成，石块表面有简单的雕刻装饰，大部分天井石块年代久远，没有经过改造修缮。早在 20 世纪末便有来自中、日等国家的高校学者来到张谷英村，尝试分析建筑群下方的排水系统规划。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推测是，天井的排水孔并未连接玉带河、水井和防火池，而是向下延伸，使雨水和生活用水被地下土壤吸收。天井通达的排水系统防止了雨水对于建筑的侵蚀，也阻止了污水对于其他饮用、生活水源的污染。

4 儒家思想对传统宗族聚落环境设计影响的当代启示

张谷英村的规划设计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湘北聚居环境，其建筑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感、建筑空间组合方式、空间功能性营造、建筑结构细部装饰极具借鉴意义，能够给与当代乡村和城市环境设计以启发：

①张谷英村“天人合一”的生态聚落观构筑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宗族聚落环境，为当代城市规划、乡村振兴提供了借鉴。张谷英村生态环境优美、周围植被茂密、动物种类丰富多样，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张谷英村村民的繁衍生息、村落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这种儒家的人本主义、生态主义设计思想是中国传统智慧，也是当代的城市、乡村规划所匮乏的，当代规划设计多独立于自然生态环境，建筑空间较为封闭，忽视人居空间与动、植物生存空间的联系与互动。

②张谷英村的空间形态极具秩序感与和谐感，具有整体性、统一性，与当代许多野蛮生长、规划无序的村落形成鲜明对比。张谷英村以轴线为核心，单元房为基础的布局形式使得聚落空间关系明确、居住顺序明显、空间感强烈；连廊式的建筑形式使得村民在建筑空间内行走自如，加强了居民之间的联系，同时有效应对了湘北地区夏季暴晒、春秋多雨的气候环境；单元房左右分布使得以天井为单位的公共空间得到有效利用，又满足了小家庭的生活需求。秩序感、空间感、和谐感、宜居性是聚居空间的重要要素，是提高空间效率、满足使用需求、加强空间与空间之间、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准则。

③张谷英村建筑群的细部装饰精工细作，是整体空间的点睛之笔，代表了张谷英村独特的宗族文化，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具有教育意义。这种体验感强、寓教于乐、赋予空间以文化精神的设计手法将会成为未来聚居空间、城市景观设计的设计手法之一。传统建筑装饰的精美工艺与当代提倡的“匠人精神”相吻合，均以精工细作为目标，力求为人居空间创造实用性强、具有美学价值的设计产品。

④张谷英村的室内外空间与村民生产、生活、风俗习俗联系紧密；文化活动是其空间的形成原因，空间的形态又制约、改变着村民的生活，两者互为因果，共同发展。张谷英村自然环境—建筑空间—村民风俗习俗的高度统一，对于当代乡村空间规划所提倡的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规划，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儒家思想对于建筑、聚落空间的影响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张谷英村的单元房依照宗法关系于建筑轴线左右排列，却受到巷道、堂屋空间的挤压，居住空间狭小。按照宗法关系的居住顺序在形式上满足了对于尊卑、长幼的要求，在现代“人人平等”社会观念下，有其历史局限性。“晴不暴晒，雨不湿鞋”的“连廊式”建筑群体使得内部建筑空间采光不足，单元建筑内部不通风。

研究传统思想文化对于张谷英村的影响是追根溯源的过程，是反向推敲、解析聚落空间形态和建筑空间设计意图的方式。研究儒家思想对于古代村落形态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空间的结构和形成机制，并且能对未来关于传统宗族聚落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宝贵的理论依据。我们应该在了解传统聚落空间形式及其文化构成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优秀环境设计、建筑设计理念和方法，尝试将传统建筑、空间美学和优秀的古村落古建筑设计方法吸收到现代设计作品中来，做到既立足于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学，又做到“守正创新”，大胆实践，创造出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建筑与环境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 [1]程孝良.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D]. 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07.
- [2]伯纳德·屈米. 建筑：概念与记号[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
- [3]彭一刚. 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 [4]刘锐. 礼制、宗族、血缘与空间——张谷英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的文化人类学解析[D]. 长沙：中南林学院，2005.
- [5]曾军宏. 试论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美学影响[J]. 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15(4):95-97.
- [6]刘沛林.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7]刘沛林. 论中国古代的村落规划思想[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 17(1):82-90.
- [8]陆元鼎. 中国民居建筑(上卷)[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 [9]李伯华，石凯霞.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及其特征分析——以张谷英村为例[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 39(3):1-7.
- [10]印朗川，李伯华，刘沛林，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生物特征研究[J]. 经济地理，2022, 42(3):182-189.
- [11]周红才，胡希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传统礼俗的保护与传承——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J]. 经济地理，2011, 31(11):1943-1947.
- [12]史少博. 儒学视野下的“风水”观[J]. 兰州学刊，2014(9):36-41.
- [13]汪溟.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与园林景观[D]. 长沙：中南林学院，2005.

-
- [14]孙天胜, 徐登祥. 风水——中国古代的聚落区位理论[J]. 人文地理, 1996, 11(1):60-62.
- [15]刘沛林. 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 [16]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J]. 地理学报, 2010, 65(12):1496-1506.
- [17]赵海青.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探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6, 15(2):104-105.
- [18]龚群, 李颖超.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12):20-25.
- [19]梁爽. 中国古建筑的礼制思想[J]. 山西建筑, 2007, 33(17):32-33.
- [20]何峰, 柳肃. 张谷英村乡土建筑的开放空间艺术特色[J]. 热带地理, 2011, 31(4):428-433.
- [21]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胞—链—形”的图示表达与区域差异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 26(1):94-99.
- [22]耿小娇, 唐振燕, 张慎成. 试论传统建筑的礼制特征[J]. 艺术科技, 2016, 29(09):43.
- [23]孔舒婷. 地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以儒家文化对曲阜孔庙的影响为例[D]. 青岛: 青岛理工大学, 2013.
- [24][日]晴永知之. 张谷英村聚落规律之研究[J]. 华中建筑, 1999, 17(1):138-139.